红旗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内部文稿

第 15 期

（总·204）

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日

目　录

·探　讨　与　争　鸣·

改革中的失调与协调……陈冬元（3）

严禁乱占滥用耕地以保护农业发展……史念海（5）

价格改革笔谈

关于价格改革的回顾……天津市（6）

北京市蔬菜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城市农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赵志义（8）

居民对价格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纪铁强等（10）

关于价格改革中的“阵痛”问题……贾秀岩（12）

·调查报告·

改革——当代中国的主旋律

——关于湖南、湖北的调查报告 ……李友滨　周溯源（14）

对温州市商品经济发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林　南　林兆木（19）

·工作研究与建议·

理顺各种关系　搞好租赁经营

——兼谈我是怎样当租赁企业厂长的 ……喻志强（24）

·书　评·

华侨、华人、华裔的成就

——读《炎黄子孙在海外》……应乃尔（28）

·国际问题探讨·

病根不除　改革无望

——简评越南的经济改革与侵柬战争 ……陈久霖（2

·国际动态·

苏联的经济改革正在深化 ……苏　司（31

·探讨与争鸣·

改革中的失调与协调

陈冬元

长期以来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失调，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发展失调，以致出现一些弊端。改革正是改革这种失调，以达到协调，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日益发展和完善，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部分单位改革并没有达到上述目的；部分改革者在勇猛"挤杀"一阵后，在改革的舞台上销声匿迹。这就向改革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失调，作好改革中的协调工作，是使改革稳步前进的一项重要内容。

认识改革过程中的失调与协调

沈阳市电车公司夏任凡任经理八个月，使亏损的公司赢利265万元，但不久又从改革舞台上被轰下去了。而夏任凡免职后公司又亏损64万元。他失败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有不可忽视的一点——即他在改革进程中忽视了对失调与协调的认识，拿他自己的话说："忽视了对理论的再学习，导致了我在纷纭、繁杂的改革实践中茫然不知所措，象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中国青年报》1986.5.6）。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有协调，就有不协调，协调与失调是并存于事物内部的两个侧面，它们是辩证统一的。自然界就是处于协调与失调这对矛盾运动之中，森林的砍伐，导致水土流失、气候变化，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工业废气排放，导致大气污染，从而改变了大气圈内部的协调，严重影响人类健康，脑血管疾病、癌肿等增加已经惩罚着人类自己。社会系统中，协调与失调同样广泛地存在着。在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会出现失调现象，通过变革，可以使其协调；在同一时期，各系统、各部门之间也经常存在着失调现象，人们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协调各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社会进步。四川省部分地区针对农业与畜牧业失调，发展牧场，这样做到了草多——羊多——肥多——粮多，经济发展了，农民富裕了，新的协调关系也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的改革是改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失调，改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发展的失调，使之达到协调。然而，改革过程中仍然会出现一些新的失调现象，局部的改革与整体之间、部分改革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之间都会出现新的失调现象。这是因为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落后状态，如习惯于"吃大锅饭"的人们，在改革面前表现出失调状态，这种状态对改革是一种消极因素，可能导致对改革者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攻击。改革者不注意这方面的协调工作，生机勃勃的改革可能夭折。

改革是建立过去没有的协调状态，新的事物难免有不完善的地方，难免保留某些落后部分。这也是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失调现象的原因之一。

改革中应把失调与协调衔接起来

我们的改革是循着失调——协调——新的失调——新的协调的路运行着，从而推动事物的发展。

改革就要破除那些不适应新事物发展的旧东西，改革那些失调状态，需要强调创新和开拓前进的精神，需要在破除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规章制度的同时，建立、完善新的规章制度，建立新的协调关系，即将失调与协调辨证地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以减少漏洞，使不法分子无可乘之机。

失调与协调是互相渗透的，这就规定了改革既存在阶段性，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在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了新的协调，科技、教育方面的失调便突出起来了；在建立了科技、教育等方面新的协调，就可能暴露其它方面的失调，改革就这样不断进行，不能停顿，要很好地衔接起来。改革者面对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能一步一步地改革，建立一个一个新的协调。

人们习惯认为协调就是井井有条，平平稳稳，失调则是无章可循，“天下大乱”。其实，协调之中仍有失调之处，失调之中又有协调的因素，认识了失调，并着手改革就意味着新的协调开始。因此，对改革，尤其是重大的改革，要积极稳妥地进行，要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回头，在积极建立新的协调的同时，不放松妥善解决新的失调。当前要特别抓紧推行那些有利于稳定经济，有利于加强宏观经济控制等方面的改革，整个经济生活稳定了，才更有利于全面改革。

做好改革工作中的协调工作

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做好协调工作，以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作好人的协调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意味着已有的平衡被打破，要求其成员调整已为他们所习惯的活动和活动方式，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平衡。从长远看，从全局看，改革的结果将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然而从局部看，从短时期看，由于人们的世界观或个人利益关系，有极少数人可能对改革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改革者要敢于坚持原则，又要善于做好宣传、说服工作，进行思想沟通；并细心考虑个人合理的要求和利益，以达到个人与改革相适合，相协调，争取更多的人积极支持、参与改革。

改革者的计划、行为可能与实际出现失调。“复杂的社会生活进程，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认识自己在事业中所处的地位、作用，以及评价自己的行为的社会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3页）。作为真正的改革者要时刻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改革者万不可认为只要开拓、创新精神，大方向正确就行了，小节算不了什么。实际上不注意协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细小失调，不注意协调各方面关系，是难成大事的。改革者对众说纷纭的议论既要宽容，又要认真对待和处理，不能退却；对于改革中的失误或困难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在失败和困难面前挺起胸膛。

（下转第32页）

严禁乱占滥用耕地以保证农业发展

史 念 海

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地位。可是当前乱占滥用耕地，耕地减少，农业的发展就必然会受到相应的限制。我国的耕地面积，按人口的比例来说，不是很多的。据统计，解放时，全国耕地为14.6亿亩，当时共有5.4亿人，每人平均可有2.7亩。1980年，耕地面积为14.9亿亩，当时共有人口9.82亿，每人平均土地减至1.5亩。1980年后，未见统计数字。有人估计，从1957年起，平均每年要毁掉农田50万公顷，而1985年，就达到100万公顷，乱占滥用耕地之风并未稍刹，反而更为严重。

全国如此，各省也有相似的趋势。以陕西省为例，建国以来，省内各种基建占地面积达1000多万亩，平均每年因此而减少的耕地约27万亩。1972年至1983年间，该省平均每年减少耕地29.98万亩。尤其是1984年，占去耕地108万亩。即使按每年减少29.98万亩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还要因此而减少耕地近450万亩。

耕地被占用的原因不一。有的是与国家重大基建有关，如修筑铁路，建立机场等，这是不容再议的。有的却不是如此。城市和乡镇、村落等居民点的无限制扩大，应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凡是能够建立城市和乡镇村落居民点的地方，都是当地的肥沃或比较肥沃的好耕地。例外不是很多的。这也就是说，城市和乡镇村落居民点的陆续扩大，实际上就是肥沃或比较肥沃的耕地相应的减少。

耕地被乱占滥用，有的地方就滥垦荒地，或破坏森林、草原，以图扩展耕地面积，这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切实保护农业耕地和森林、草原"。这是完全正确的说法。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财政部王丙乾部长提出了国务院拟定的若干有关财政的主要政策性措施，其中第五项为：关于开征新税和适当调整某些税率，增加财政收入的问题。并说："为了限制农村和城镇占用耕地，调节收入，拟从今年起，对农村非农业新占用耕地征收占用税，征收的税款，一半留给地方，建立农业发展专用资金，用于开垦宜耕土地和整理、改良现有耕地；另一半上交中央财政，由国家统一安排使用"。对于这样的措施，我们期期以为未可。当前财政固属困难，但耕地的减少确实也是惊人。开征非农业新占用耕地的占用税，并不一定就有补于国家财政收入。相反的，却更易引起对于耕地的新的乱占滥用。占用耕地的如为国家或地方机关，则所征的占用税，实际上还是出之于国库，于财政上并非能有真的补益。另外，正是因为征收了占用税，占用者就可有所借口，而占用更多的耕地，不必再有任何的顾虑。既然开了这样的口子，耕地就难免会有更多的减少。兹事体大，望能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关于价格改革的回顾

天津市价格学会、天津市物价研究所课题组

八年来，我们对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价格改革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前后进行了六次重大价格调整，采取了三项重大放开价格措施。

第一次是1979年上半年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十八种主要农产品，平均提价24.8%。农民当年因提价增加收益108亿元。这次调价的步子可能大了一些，但效果突出，是值得的。

第二次是1979下半年提高八类副食品价格及其相关制品价格。这次提价幅度约30%左右，同时，每个职工加发5元副食品价格补贴。

第三次是从1979年起调整了煤炭价格，这次提价幅度约30%。此后，又先后调整了生铁和部分钢材价格。这一段的生产资料价格调整是适度的。

第四次是1981年提高烟酒价格，降低涤棉布价格。这次调整对于减少烟酒原料补贴，平衡烟酒供求关系，以及解决涤棉布价高利大盲目发展，产品积压的矛盾是必要的。

第五次是1983年全面调整纺织品价格。化纤布调低，纯棉布提高。这次调价，解决了化纤布滞销积压的问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衣着结构。

第六次是1984年对铁路货运和水运客货运价格的调整，铁路货运价格提高21.9%，水运价格由按重量改为按重量或体积择大计费。初步解决了交通运输价低的矛盾。

与此同时，前后采取了三项重大放开价格的措施。

第一项是放开对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交售任务后的一、二类农产品价格。从1980年起，实行了市场调节价格和指导价格，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改善供给，丰富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项是1982年起前后分两批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实行了市场调节价格，价格由产销双方协商订价。小商品价格放开后，从天津市情况来看，第一年降大于升，第二年升降持平，品种增加；到1985年出现只升不降，并发生了有的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原因一是原材料大部分为计划外，不仅数量无保障，而且价格成倍上涨。二是企业经营机制未解决，应变能力差。

第三项是从1984年起，我市前后对部分纺织品、针织品、服装、高档皮鞋等商品实行了优质加价政策，对来料加工服装收费实行了浮动收费，并根据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有关规定，对生产资料的超计划生产部分实行了20%幅度浮动价格。

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公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价格改革进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第二阶段。两年多来，前后采取了四项重大放开价格措施，两次重大价格调整。四项放开价格的措施是：

第一项是放开了生猪和其他鲜活副食品价格。我市于1985年5月10日，按照中央部署，对肉、蛋、菜实行了国家指导下的议价，对其它产品价格实行了市场调节价。销价上涨后，国家按人口每人每月补贴7.5元。

第二项是放开对工业生产资料计划外的价格，从1985年起，取消了加价20%幅度限价，随行就市，指导价变为市场调节价。价格放开后钢材价格上升1—2倍，高出了国际价格，1986年略有回降。

第三项是，1985年、1986年前后分两批对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收录机、中长纤维布和80支以上棉纱及其织品共计11种主要日用工业品，按照产品质量，分别实行不同形式的国家指导价格。

第四次是1986年上半年放开南方木材价格，实行了市场调节价。由于放开后，乱砍乱伐，年底退回到指导限价。

两次价格调整是：

一次是1985年，对粮、棉、油购销价格体制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收购价由超购加价改为固定比例作价。粮价改后上升1.8%，棉花下降3.2%。远远低于其他放开农作物价格上升幅度。

另一次是1985年提高了铁路短途运价，对百公里以内的客运价和二百公里以内的货运价分别作了上调。农村返销粮价，实行购销拉平。

八年来价格改革，通过八次大的调整，七次放开措施，尽管在每次调整与放开措施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讲，缓解了价格体系与管理体制中四个方面的矛盾。

一是缓解了农产品同工业品比价偏低的矛盾。我国农产品换工业品的数量1985年比1978年增加了51.6%，天津市工农产品比价缩小了65.2%。

二是缓解了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同工业品比价偏低的矛盾。1985年采掘工业产品价格上升了50%，大大高于原材料加工工业产品价格上升11%的幅度。工业内部各行业盈利水平差距有所缩小。

三是缓解了同类商品各项差价偏低，特别是质量差价偏低的矛盾。一些长期购销倒挂，得以理顺。大部分名牌、优质、传统产品，贯彻了优质加价的政策。

四是缓解了价格管理体制中过分集中的矛盾。1986年同1978年对比，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国家定价部分，已由97%，降至47%；国家指导价由0.5%增至19%；市场调节价由2.5%增至34%。

八年来的价格改革由于上述各方面矛盾的缓解，从而取得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显著成效：

一是，促进了生产。八年来，农业、工业生产发展是举世公认的。虽然这不能完全记在价格改革的帐上，但可以这样说，没有价格的改革，就不会有这样高的发展速度。

二是，活跃了流通。八年来全国社会零售总额增长了2.17倍，我市增长了1.71倍。主要原因是生产发展了，但是与理顺各项差价，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是，调节了分配，特别是农民的收入增加了。1986年同1978年对比，农民纯收入全国增长了2.16倍，我市增长了3.15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提价增加的。

四是，丰富了消费。八年来的价格改革，一方面是零售物价指数不可避免地有所上升。1986年比1978年，全国上升了35.8%，我市上升了35.9%，但同时职工平均工资，全国上升了1.17倍，我市增加了1.12倍。收入增加了，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也随着变化。吃的比重相对下降，穿用的比重特别是高档耐用品比重上升了。吃的比重虽然下降，但吃的素质提高了。消费丰富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发展，但是，如果仍然采取过去工资不动，物价也不动，肯定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市场繁荣景象。

八年来的价格改革所以取得显著的成效，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价格工作本身来讲有以下三个突破：

一是物价理论上突破了价值规律对生产没有调节作用的框子。自觉地利用了价格机制作用。

二是在物价方针上突破了稳定物价方针的束缚，实行了结构性调整。

三是在物价管理上突破了集中管理、单一价格形式，企业无定价权的模式；实行了多层次定价，多种价格形式并存的体制。

当前，价格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许多改革措施特别是近二年来，是超前的多，滞后的少，总的讲步子大了。需要疏导、整顿。

二是许多重要政策理论方面的问题认识还不一致，需要深入研究解决。

三是下一步改革的路子，亟待探索。

北京市蔬菜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城市农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赵 志 义

(一)

北京市从1985年5月10日开始，进行了蔬菜购销体制的改革，改变了长期来蔬菜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的经营体制，实行多层次、多渠道经营，允许农民、菜贩进城出售蔬菜，放开了蔬菜的价格。在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开放了城市农贸市场，彻底摘掉了把农贸市场斥之为“资本主义”的大帽子。

这次北京市蔬菜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城市农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过去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大胆尝试，是全市经济体制改革迈出的勇敢的一步。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出现

一些问题，特别是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的最初半年，由于生产和管理工作方面的政策、措施没有很好落实，国营商业在思想和工作上准备不足，没有来得及参与市场调节，菜价突然上涨，幅度又是如此之大，使居民生活受到了影响，难以承受。经过半年的工作，贯彻了蔬菜生产“立足本市，稳定提高近郊，大力发展远郊，充分发挥外埠优势”的方针，并进行了购销体制进一步放开的做法，使蔬菜货源比较充足，上市均衡，品种也明显增多，菜价也逐渐稳定，改革措施为广大消费者理解和适应。北京市蔬菜购销体制的改革，改变了北京市长期来实行的计划生产、计划调拨、计划分配的高度集权制，农贸市场管严管死的作法，使城乡经济恢复了生机活力。

（二）

蔬菜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蔬菜价格的改革是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关心的大问题。改革后蔬菜价格确是上涨了。以十二种当家菜为例，1987年与1983年同期对比，其中的十个品种上涨幅度较大，只有两个品种略有下降。如：冬瓜1987年7月12日每斤零售价0.15元，比1983年同期上涨138%；小辣椒每斤零售价0.48元，比1983年同期上涨344%。农贸市场的蔬菜价格，1986年全年平均比1985年上涨116.6%；1987年上半年比1985年上半年平均上涨120%。

蔬菜价格的上涨，主要是价格开始按照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上下浮动，改变了过去限价的做法。生产资料价格上调，成本加大，也是蔬菜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菜价上涨，生产者是满意的。他们种植蔬菜的积极性高了。菜价上涨，虽然使消费者的生活支出增加了，不过居民的收入也增加了。近几年来，职工、干部的工资有了提高，就业面大了，企业、单位发放的奖金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还按月发给每个居民生活补贴，居民对菜价调整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由于居民收入增加的幅度不同，他们对菜价上涨的承受能力大些，他们主要对能够买到鲜、嫩的品种，感到满意。对于奖金收入较高的职工和就业人口较多的家庭，对菜价上涨，也是能够承受得了的。但对于工资提高的幅度不大以及奖金不多的职工，就感到承受不了。他们增加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被菜价上涨抵销了，因而议论多，意见大。这部分人并非少数。再者每月发给居民的副食补贴，并未包括菜价上涨的部分。这种情况不能忽视。当然，购销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也是大的。

（三）

北京市蔬菜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城市农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要逐步加以解决和不断完善。当前需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一、必须改善国营蔬菜商店的经营管理工作。目前仍然有不少菜店管理不善，烂菜多，造成亏损。有的商店调价不及时，菜价比农贸市场还高。国营蔬菜商店应充分发挥资金雄厚、人力充足和布满全市的商业网络这些优势，积极参与市场调节，扩大经营，提高服务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既要把市场管好，又要把市场搞活，以促进蔬菜购销体

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二、切实加强市场管理，搞好市场秩序。目前农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出售冒牌假货，质量低劣的商品，还有缺斤短两，倒卖票券以及卫生条件差等问题，甚至发生欺行乱市、强买强卖、哄抢商品等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治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组织力量进行综合治理。除了对市场内加强管理外，还要加强市场外的管理；除了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检查管理外，还应加强宣传，不断扩大效果。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开放好市场，搞活经济。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居民对价格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

纪铁强　邓树田

居民对价格改革的承受能力包含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上表现为经济的承受能力，主观上表现为心理的承受能力。两年来，我们在价格改革中注意了提高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1985年放开生猪等副食品价格以来，我们采取了发放价格补贴，调整退休金等一系列措施，使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增长21%，大大超过了同期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平均上升10%的幅度。但是由于我们对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注意不够，所以，虽然价格调整后，居民的收入多了，家底厚了，生活提高了，但不少群众对价格改革的意见还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障碍着价格改革的进程，本文拟对影响居民心理承受能力的因素和提高承受能力的措施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影响居民心理承受能力的因素分析

1、对价格改革目的、内容、意义还不十分理解

据调查，对价格改革意义认识比较清楚，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不改不行的人占29%；对价格改革的意义认识不清楚，没有表明态度的人占33%；认为价格改革没有必要，希望既不要涨价，也不用补贴的人占27%；认为价格改革会带来通货膨胀，使生活水平下降的人占11%。有的说："一调价咱们肯定吃亏，吃亏吃在哪也闹不明白。"

对结构性调整，采用变"暗补"为"明补"的办法，放开生猪等农副产品价格，群众还比较理解。但对于原材料价格调整而引起的部分工业品涨价，群众则不理解。他们说这是"连锁反应"，是"轮番上涨"。对于为了促进调整产品结构而采取的优质价措施，群众更不理解。许多群众说这是"变相涨价"。

2、生活目标

生活目标决定了人们的消费需求，当一个人的经济目标过高，消费需求和他的支付能力发生矛盾的时候，价格问题就会变得十分敏感。据调查：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很多钱"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把"稳定物价或增加收入"做为自己目前最关心的事情；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吃好、喝好、穿好、住好"的人中，有67%的人把"稳定物价或

增加收入”做为自己目前最关心的事情。这表明，生活目标是影响居民对价格改革心理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

3、收入水平

据收入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的相关分析，其图型为“抛物线型”。即生活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心理承受能力差。而近两年来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心理承受能力则相对强一些。

据市区千户居民家计调查，占居民总数10%的低收入家庭，主要是由以下四种类型家庭构成的：一是依靠退休金和赡养收入生活的老年人家庭；二是多子女、少就业的家庭；三是工资低或经营不善企业的职工家庭；四是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的家庭。这四类居民家庭担心物价上涨，尤其是担心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这些消费他们躲不开，减不了。他们对价格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较低。另外，约有20%的居民，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高于平均水平。“暗补”改为“明补”后，消费水平高必然要多负担一部分涨价后的支出，加上这类居民有一部分近几年增资幅度低于中、低收入水平的职工，收入差距在缩小，因此他们对工资改革和价格改革的意见也比较大，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低。

4、家庭负担

调查发现，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家庭负担越重的，心理承受能力越低。从年龄分布看，老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弱于青年人。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老年人在家庭中有一种“责任感”，他们通常把子女的成家立业，以及隔代人的抚养都看成自己的事情，他们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都很重。从家庭类型上看，独生子女家庭的心理承受能力弱于其它类型的家庭，对价格改革也较敏感。

5、政府对价格改革的管理能力

几年来，我们的价格改革都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虽然有时步子迈得大了一些，在配套改革上衔接不够紧密，但总的讲，价格改革还是成功的，市场繁荣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市场上并没有出现物价飞涨、生活必需品紧缺等不正常现象。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居民对价格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值得提出的是，当前在价格管理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变相涨价”、“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减低了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

二、提高居民心理承受能力的措施探讨

1、制定价格改革的总体规划

要在调查研究价格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社会心理影响的基础上，制定价格改革的总体规划，阐明改革的方针、原则和改革的目标、步骤。既要把价格改革看作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又要把价格改革做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抓；既要强调坚持改革，又要强调稳步前进。前一段，有急于求成的苗头，两年价格指数累计上升了20%，步子迈得大了一些。有鉴于此，能否把调整工农产品比价，调整部分原材料价格和调整优质商品价格三项目标分解在几年完成，经过几年乃至十几年的努力，逐步理顺价格关系，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在当前居民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情况下，能否考虑1987年价格调整幅度再略低于上年水平，把调整原材料价格和优质商品价格的步子迈得小一些。

2、做好价格改革的宣传工作，提高居民的认识水平

在改革宣传中，要使群众认识到价格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生产力，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这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某一阶段，某一局部，价格改革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大家都应有为改革做贡献的觉悟和思想准备。同时要用大量事实说明改革对生产的促进，宣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

3、要加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正确引导。

要倡导艰苦创业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思想，要使广大居民认识到，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较贫穷，生活消费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做好青年人及独生子女家长的消费引导工作。同时要控制货币的投放，使居民的消费增长速度不超过商品生产的增长速度。

4、加强价格管理工作，确保消费者利益不受侵犯。

要建立、健全有关物价方面的法规。还要把好新产品、新规格、新花色商品的定价关，对于质价不符、价格过高的，一定要及时纠正。有了法规，既可以使执法人员有章可循，又可以使用经济赔偿等手段确保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侵犯。在加强物价管理方面，当前要重点抓好农贸市场和摊群市场的价格管理。对于哄抬物价、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商贩和内外勾结，吃私受贿的物价检查人员要从重处罚。物价管理人员要与街道居民物价监督小组结合起来。力争做到出现问题就有人管，管了就有效果。

5、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切实解决好部分低收入户的实际困难。

据调查，1986年同1985年比，全市有17.5%的家庭生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1〉退休和无职业的老年人家庭，物价上涨幅度大，实际上他们的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2〉就业人口迁出，职工退休导致收入减少。〈3〉病、事假多或企业经营不善造成工资或奖金收入减少。为了解决好这部分人员的实际困难，我们建议：尽快实行退休金、救济金同物价指数挂钩的措施，以保证离、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适当提高“三龄”具备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比例，以利老人们安度晚年；发展社会保险事业，以保障经营不善的企业职工生活水平。

（作者单位：天津市统计局）

关于价格改革中的“阵痛”问题

贾秀岩

“阵痛”是一个医学术语，它与对人体造成的伤痛不同，前者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后者则是一种病态。前者是短暂的疼痛，没有“阵痛”就不会有新生命问世。在新的价格制度诞生之时，整个经济机体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这种正常的“阵痛”，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并不是价格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把价格改革放在广阔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来考察所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随着价格改革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价格改革的发展而发

展，并将随着改革的结束而解决。

根据我国的情况，价格改革给社会经济机体带来的“阵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带来的“阵痛”

从1979年以来，我国零售物价总指数连年上升，由于过去遗留的问题很多，预计改革起步以后，这种情况只能有增无已，零售物价指数尤其是副食类物价指数的上涨，对社会各阶层群众将带来很大震动。这里，既有长期以来习惯于物价“稳定”，对合理调整物价不适应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又有一些实际问题。如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退休职工，以及人口多，职工少的家庭等。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使他们感到受到损失。

2、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提高带来的“阵痛”

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提高，加工工业将要承受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加工工业为主的城市、地区以及从事加工生产的企业将减少收入。譬如，随着生铁、钢坯、电力、煤炭、皮革、纸浆、木材价格的上升，轧钢、炼铝、炼焦、皮革加工、造纸、木材加工等企业的生产成本都要上升。

3、价格改革初期给国家财政带来的“阵痛”

在价格改革中，调整比价、差价的各种措施，以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和价格形式的多样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财政收入。比如，取消国家对煤炭亏损企业补贴后，用煤企业增加成本，减少财政收入。而采煤企业所增加的收入并不全部上交财政，其中有些要留在煤矿还欠帐。又如，取消房租补贴以后，国家要给职工增加工资。财政多支的这部分钱也不能从房租中全数收回，其中有一部分要留给房管部门用于维修旧房，还欠帐。再如，取消粮油价格倒挂之后，国家要把价格补贴变为货币补贴直接发给居民，而居民并不是把这些全部用来买国营商店的粮油，其中有一部分要流入集市贸易，进入农民手中。对副食品的货币补贴也有类似情况。

总之，在价格改革中，公民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各省与国家之间发生了利益的再分配。在这种分配中，受利的一方感到满意，而受损的一方则感到震动或不满。这种利益的再分配，是由价格的本性决定的。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价格的变动，只是“已有财富的另一次分配，是‘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马恩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61页）。在每一次价格变动中，尤其是价格改革这样大规模、大幅度的价格变动中，不可能人人得利，无人受损。过去三十年间我们不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体制比较僵化，价格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发生什么影响。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是向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过渡，价格作为财富天平上的砝码的本性会充分表现出来。国民经济体系中每一个企业，都要作为商品生产者承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每一个公民也要作为商品的购买者承受价格变动的影响。“阵痛”，是在所难免的。

我们应该认识“阵痛”，宣传“阵痛”的不可避免性和暂时性，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改革必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但也不能企求每项改革

（下转第27页）

·调查报告·

改革——当代中国的主旋律

——关于湖南、湖北的调查报告

李友滨　　周溯源

最近，我们以“改革”为主题，到湖南、湖北两省作了一些调查。江南大地，处处吹拂着改革的春风，从干部到群众，人人谈论着改革，关心着改革，人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扎实地前进。目前，广大干部和群众热望改革进一步深化，早日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农村正在进入第二步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非常关心农村，首先在农村打破了“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连年增产。湖南省桃源县、湖北省襄阳县都是这样发展的。如襄阳县有农业人口100万，耕地140万亩，1980年粮食总产为7.8亿斤，1986年上升到14亿斤，年约增产1亿斤。农民的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109元增长到1986年的530元。而且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因制地宜，发展了多种经济，农村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全县的46万个劳动力中已有15万人（占32%）从种植业转移到养殖业、商业、工业、服务业，开拓了新的生产领域。襄阳县牛首区竹条镇，人均只有三分地，过去常年吃返销粮，属于穷困镇，是县的一个包袱。如今该镇4个村专门制作和推销童装，销往15个城市，一部分童装还销往国外，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一跃而为富裕的地区。

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从心眼里拥护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现在他们正满怀信心，扎扎实实地规划着第二步改革。

第一，引导农民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主要办法是鼓励农民因地制宜，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和发展各种专业户。如襄阳县始终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首位，扶持种粮大户。该县有土地300亩以上的粮食大户35户，刘文豹一户种地1000亩，今年夏粮总产30万斤，向国家交售25万斤，预计再交秋粮5万斤，共向国家交售30万斤。他们还鼓励建立养殖专业户，凡养牛5头、猪10头、鸡50只，鱼塘20亩以上的，都在饲料、防治病疫等方面给以支持，现在该县已有这类养殖专业户一万多个。同时，全县各区都根据本地的优势，发展多种经济，出现了大头菜、生姜、葱、麦冬、藕和烟叶的生产基地。现在，该县农村的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致富，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过去那种“种田混个肚儿圆，养猪为了过个年，养鸡下蛋换点油盐钱”的自然半自然经济，是永远摆脱不了贫困状态的。

第二，搞好双层经营，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小农经济逐步向现代化农业过渡。在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为了分配公平合理，把土地划得很零散，有的把农业机械、茶场、山林也分掉了，当时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被分割成小长条，小方块的耕地，无法挖沟渠，浇不上水，治不了虫，更不能机耕，诸多不便，成了农业现代化的阻力。生产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之有利于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他们的办法是健全村镇的集体经济，以支持个体户、专业户的发展，发挥双层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土地、茶场、山林和拖拉机等，按“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重新规划，对分散的小块土地，适当调整，鼓励土地向种植能手集中。茶场、山林也实行集中管理，以求收到较大的经济效益。农业机械、水利设施、植物保护、推广良种等，也计划逐渐由村镇经济组织统一管起来，对专业户做好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走集体化生产的路，向现代化大农业过渡。这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越来越多的干部逐渐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组织要善于依靠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经济手段引导农民走现代化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

第三，进一步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济，使整个农村早日富裕起来。广大干部认识到，农村要致富，必须在保证粮食稳定增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乡、各村在资源、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发展多种经济，如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家庭副业等。市郊的县，除注意发展蔬菜生产和养殖业，保证城市农副市场的繁荣外，还要围绕着建材、土特产品加工、纺织品、食品工业等发展生产。襄阳县领导还提出重视庭院经济，不仅充分利用宅院种植蔬菜、养猪、养鸡，而且使该县900多种传统手工艺产品，如柳编、刺绣等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

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前进中也有阻力、有困难。当前农民反映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价格不合理，粮价低，农业生产用的化肥、农药以及经济作物、工业品的价格高，影响了农民种粮、种棉、养猪的积极性。二是摊派多，农民负担重。这些都是值得重视并需及时妥善解决的。

改革使企业有了生命力，活起来了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凡是改革搞得好的企业，确实活起来了，有了生命力。

第一个“活”字表现在，企业大胆进行改革，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企业。

实行改革、开放后，有的同志产生过一种误解，认为办现代化企业就是要靠引进，就是用钱买一个现代化。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闭关自守，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引进先进的设备，但引进的目的是为了消化、吸收，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改造，要发展创新。现代化只靠花钱是买不来的，而且引进只能是少数最必需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必须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路，走改造、革

新、挖潜的路，即充分发挥自己科技人员和工人的作用，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积极采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包括引进少数必要的技术和设备），用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这就是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企业。武汉市汽轮发电机厂就是这样做的。该厂过去是一个亏损单位，1981年亏损达240多万元，是全国同行业亏损最多的大户，工人生产积极性低落，劳动纪律松弛，濒临倒闭。人们议论说："这个厂没办法了！"1982年来了新厂长于志安，他大胆实行改革，首先是领导班子以身作则，团结全体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懂得在当今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能不能及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一个企业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是伸手向国家要投资，单纯依赖引进，而是发动技术人员和工人从本厂的实际情况出发，修旧利废，大搞技术革新。五年来，他们共完成技术改造项目140多个，为国家节约更新设备投资3000万元。赵紫阳同志对他们的技术改造概括为"旧设备加电脑控制"。正是这些废旧设备经过改造加工后，使这个过去只能生产中小型发电设备的企业跻身于全国大型发电设备制造企业的行列，总产值从2000多万元上升到8000多元，利润年均递增211%，去年盈利达1000万元。人们说，该厂走的是改革之路，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企业，同时在技术更新改造的实践中培养出一代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工人。最近他们又倡议建立跨省区、跨行业有50多个成员参加的大型企业集团——"长江动力公司"，承包国内大型成套工程、开发新的产业体系、开发新产品，并联合开拓国际市场。该厂为这个集团的龙头厂家。

第二个"活"字表现在，小型企业搞租赁经营制，是实行厂长负责制，搞活企业的有效办法，也有利于人才流动，有利于青年人锻炼成长。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们常常遇到两个问题。一是人才问题，大企业人才积压，英雄无用武之地，中小企业又缺少人才。二是实行租赁制后，人们心存疑虑：它姓"社"还是姓"资"？这两个问题已在实践中找到了答案。湖北宜昌市轮胎翻新厂，是个有200多工人的集体小厂，在吃"大锅饭"的旧体制下，连续四年亏损，累计达90多万元，陷于停产。市委决定对该厂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文远荣等四名在国营大厂工作的知识青年（三名大专毕业生，一名中学毕业生）用自己的财产作抵押投标，他们感到在大工厂有劲使不上，甘愿少拿工资和奖金，到工作条件艰苦的小厂冒一番风险，目的是施展才华，为社会主义作点贡献。由于他们有理想、有干劲，又有文化、有技术，中标后来到工厂如鱼得水，不仅能够和工人一道奋力拼搏，加班到深夜，也不多拿一分钱。而且能够按党和国家的政策，结合工厂的实际，进行全面改革，根据社会需要组织生产，按劳动成果进行分配，很快打开了局面，把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全厂职工对他们信得过，积极性也高了。五个月后，工厂第一次出现了盈利，发展势头很好。这证明一些有志的知识青年是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愿意用所学知识为人民服务的。市里对他们很满意，认为他们办的是社会主义企业，而且为多年犯愁的人才流动找到了一条路子。

第三个"活"字表现在，实行厂长负责制后，党、政、工"三驾马车一个套，同吹一把改革号"，全厂职工齐心干社会主义，企业越办越活。

实行厂长负责制后，不少人担心党政关系不好处，书记、厂长的位子不好摆。武汉金笔厂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过去该厂是"书记说了算，厂长照着办"。工厂盲目

生产，积压各种金笔200多万只。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去年实行租赁。新厂长喻志强自觉注意处理好党政关系，他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变成“厂长说了算，书记一边看”，而是努力做到党政工团通力合作。他给自己规定了行动准则：掌权不独揽，用权不武断，决策不单干，监督不反感。他还和党委、工会研究，要求全厂干部做到“三分三合”和“四不”，即“职责上分，思想上合；工作上分，目标上合；制度上分，关系上合”；“分工不分家，参与不干预，保证不包办，监督不刁难”。党、政、工三者关系理顺了，全厂职工“心齐、气顺、劲足”，根据社会需要组织生产，并改革了工资和奖励办法。就这样，仅用一年多时间，一个濒临破产的烂摊子变成了一个先进单位，一个450人的工厂，在全国建立了600多个销售网点，年产各种金笔660多万只，比过去增长近一倍，产品总是供不应求。今年1—5月实现利税115万多元，为去年同期的464%。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的改革复杂、艰难得多，旧的模式和习惯势力严重束缚了一些人的思想，以致改革遇到重重阻力。有些厂长反映，现在的计划、财政、劳动人事部门的一些做法，仍然把大多数厂长捆得死死的，厂长没有多少自主权，企业远没有搞活，阻碍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急需把改革深入一步。

当前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积极参加改革的实践

我们在调查中，接触了不少在各级党委宣传部、党校、社会科学院以及报刊工作的理论工作干部，大家热烈拥护中央关于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并且回忆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改革的情况。比如，三中全会前后，理论界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积极宣传了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对于破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思想，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农村改革中，宣传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对商品经济的研究作了大胆的突破和广泛的宣传；对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作有益的探讨。这些事实说明，理论界是党中央制订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政策的得力参谋和积极宣传者。总的来说，我国的理论界是好的，在政治上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今天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改革的伟大意义认识还不深刻，理论联系实际作得还不够好，对改革中遇到的阻力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改革中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也没有及时给予总结，提到理论的高度，再回过头来指导实践，而且在前一段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重要时刻，由于缺乏思想准备，也没有及时进行反击。这是应该汲取的重要教训，今后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提高对改革的认识，有计划地深入改革实践，与工、农、商以及教育、科技各界的实际工作者一道研究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改革出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做好有关改革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同志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全面、准确、系统地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正是他引导我们解放思想，突破那些陈旧的、僵化的条条框框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

来，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又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理论工作者首先要认真学习，并结合改革实践，全面、准确、系统地阐述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并协助各级党委组织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这是我们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2、深入、系统地研究、宣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引导我们正确地了解中国的国情。据此，党中央作出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论断。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是带有全局性的根本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我们制订方针政策也必须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出发点和依据。只有这样，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深刻地理解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搞活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理论工作者要深入地、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既要讲清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又要讲清初级阶段是不成熟、不完善的阶段，在中国来讲，特别是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因此，初级阶段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围绕这个中心，服从这个中心，而不能脱离这个中心。在克服“左”的阻力、排除右的干扰时，也要明确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3、深入进行改革、开放、搞活的理论宣传工作。赵紫阳同志多次阐明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开放、搞活。当前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是深入领会、正确把握住这两个基本点，从整体上认清这两个基本点唇齿相依的统一关系，二者的结合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完整内容，才有生命力，才是有血有肉的，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我们在工作中要向广大干部群众讲清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过去僵化的模式，不是书本上的结论，而是要看社会生产力是否发展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否得到充分发挥了。同时，要深入实际，总结在改革、开放、搞活中的先进典型，介绍他们的经验，宣传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勇于开拓、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和坚持学习、推广先进科学技术的顽强意志，以及行之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好办法。

4、深入研究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许多同志认为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在革命战争时期是这样，在革命胜利、党成了执政党以后更是这样。党风是无声的命令，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量。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员身先士卒，全心全意为人民作出奉献，就能团结、带动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今天我们的党风好，党员站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前列，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贡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以权谋私，就会团结、带动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改革、开放、搞活的实践活动，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大家还说，党风好的关键，在于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这个理论要深入研究，把道理讲清楚，党员干部的教育搞好了，就必然会带动4000万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全国人民就会学我们的样子，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对温州商品经济发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林　南　　林兆木

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是传统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建国以后温州经济发展几经挫折，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错误地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吸引了许多人前往参观学习。1986年浙江省确定温州为试验区。

温州市现辖9县2区，总面积11700平方公里，人口620万。1983年以来，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以1985年与1977年相比：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从14亿元增加到57亿元，翻了两番多；农民人均收入从55.6元增加到447元，翻了三番多。1985年全市128.8万户农民中，有40多万户的年收入超过4000元。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乡镇，“万元户”已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一到一半以上，它向人们提出了不少值得认真研究的新经验和新问题。1986年11月间，我们在温州进行了10天的调查，现就调查中看到听到的情况和一路上思考的几个问题，整理如下。

温州农村家庭工业是怎样发展的

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发展迅猛，到1985年共计13万多户，产值11.4亿元，占全市农村工业产值的64%；加上全市城镇民办工业，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5%左右。同时，家庭经营的商业、运输业、服务业也相应发展。1985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个体商业占33.8%，超过了国营商业（25.1%）；交通运输业中个体经营的客运量占58%，货运量占65.2%。全市农村已有60%左右的劳动力从土地经营中转移出来。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民，纷纷迁到集镇，促进了农村小城镇的建设。全市86个镇的年产值都在1000万元以上。

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特点是从事小商品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投资少，技术简单易学。一个乡、一个村主要生产一、二种或几种商品，形成了区域性的专业化生产，品种规格比较齐全，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如苍南县金乡镇有家庭工厂2931户，主要生产铝制品（徽章、标牌），塑料片、塑料红膜和涤纶商标；产品有3000多种。据说全国各大学的校徽近一半在此订货。仅1985年该乡消耗塑料达8400吨。

温州农村工业生产主要利用边角余料、废旧料，成本低，不与大工厂争原料。如苍南县宜山区再生纺织品产销基地，每年购进全国各地化纤厂和服装厂的下脚料3400万斤，加工再生产的产品有：棉纱100万斤，布300万匹，晴纶衣裤1.5亿件，拼料童装2亿件，塑料编织袋6000万个。再生的纺织品价格低廉，对消费者有吸引力。

农村家庭工业的特点之一是小批量多品种，以销定产，薄利多销。一般是订货合同签订后才组织生产，库存和产品积压少，资金周转快。他们善于在“低”、“远”、

“小”和“快”字上做文章。即产品以低档为主，多数销往农村和边远地区，小批量，善于捕捉市场信息，对市场反应快。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家庭工业开始走向联合，这是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有松散的联户经营，有合作工厂，也有股份企业。乐清县柳市区，生产低压电器的企业，1986年搞联合的已达1563个，占全区企业总数的82.1%。除私人合股办企业外，也开始出现与国营企业联合的“公私合营”企业，也有的与外省搞横向联合。农村家庭工业走向联合，有利于在农村中形成一批新兴的骨干企业，从而带动家庭工业提高技术，开发新产品，满足市场不同层次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

但是，随着家庭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雇工经营越来越普遍。全市雇工超过30人的已有100多户。雇工大多数来自附近落后的农村和山区。金乡镇外来的劳动力已占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多数人认为，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允许雇工利多于弊，雇工是取得一定规模效益所必需的；有利于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使这部分人学到一门技术，加速家庭工业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偏僻落后的农村山区推广。森力人针织厂从1983年至1986年先后雇工140人，现有雇工60人，但从建厂至今一直留在该厂的只有10人，其余的都先后离去自己办厂或与他人合作办厂，该县新成立的6个针织厂，就是这种情况。

雇工经营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雇佣童工相当普遍。童工大多来自贫穷的山区或附近农村，他们做工的收入虽然比在家务农要多，但劳动条件很差。在金乡镇我们见到十二、三岁的两兄弟在一家徽章厂劳动，他们在一起做证章的毛坯，小的用钳子夹模子，大的举榔头敲打。计件工资每日可得5元左右，但算下来要举榔头敲打五千次左右，对一个十二、三岁孩子说来，劳动是不轻的。还有做塑料夹子的小姑娘，坐在高频机前焊接塑料片，劳动虽不重，但焊接时产生的幅射线和气体对她们身体是有害的。这些童工一般每日劳动都超过八小时。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有关部门虽有规定禁止，但应有得力措施加以贯彻。

产品质量是农村家庭工业的又一个突出的问题，也是引起社会舆论对温州经验持怀疑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低；工艺设备落后，土法上马手工操作；原材料全部或大部采用废旧料，许多产品的强度、韧度达不到要求；为追求利润偷工减料，粗制滥造。一些产品由于质量不高，出售时采取行贿手段、伪造商标或以挂户经营的厂名掩护。质量问题成了农民家庭工业健康成长带根本性的症结所在，已引起一部分干部和经营者的重视。例如乐清县政府决定投资100万元在柳市建立电器产品测试检验中心，规定商品通过检验取得合格证始能外运。

此外，在家庭工业比较集中的集镇，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家庭工业，住家和生产场所混杂在一起，落后的机器和手工操作带来严重的噪音，有的产品在制造过程中产生有害的气体，污水随处排放等等，都会危害居民的健康，破坏生态平衡，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家庭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是怎样解决的

温州家庭工业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家庭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不能靠国家计划供

应，产品的销售也不可能靠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收购。搞活流通，发挥市场作用，是家庭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温州13万户家庭工厂，从业人员40多万人，平均每户不足4人，显然不可能户户都设专人搞采购和推销。他们搞活流通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建立各种商品市场400多个，在家庭工业集中的地区形成了产销结合型的专业市场130个，其中有年交易额在1亿元左右的十大专业市场。二是有一支号称十万大军的购销员队伍。这批购销员不隶属于某一工厂或企业，而是独立的、自负盈亏的个体经营者。这些购销员是从“卖货郎”中发展起来的，有丰富的经验，熟悉市场行情，又了解本地家庭工业的底细，其收益同购销的差价和成交额的大小直接关联。因此，他们的积极性高，服务热情，不少人深入穷乡僻壤，通过各种渠道为家庭工厂组织原材料、推销产品，签订合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购销员是家庭工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依靠这支大军冲破了过去的格局，面向全国，蓬勃发展。

购销员大军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环节大大减少。产品可以直接到达消费者之手，加速了资金周转。同样，原材料也多是从产地购进直接供给家庭工厂，利于降低成本。生产合同很多是由购销员从各地组织来的，做到以销定产，既避免产品滞销积压，又可以减少流动资金。这是小本经营的家庭工厂能够日益发展的重要条件。

温州农民购销员大军的形成和发展为探索我国流通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人认为十万购销员满天飞是不可取的。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国地域辽阔，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不健全，一方面许多国营和集体企业产品滞销，开工不足，另一方面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众多消费者却买不到称心的商品。这几年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发展迅速，就凭有这样一支购销员大军，深入全国各地，特别是到国营企业供销部门不屑一顾和不愿去的地区，做成了国营和集体企业想不到和做不成的生意。

购销员的收入过高也是人们议论的一个问题。温州发展商品经济是走以商带工的路子，初期搞流通的人收益大，是合乎规律的。抽样调查表明，购销员中有70%的人赚钱，30%的人保本或赔钱。赚钱的每年可得几千元，最高的10万元以上。这70%的人每年营业额在3万元至30万元，最高的达170万元。根据营业额的数量，按10%的纯收益计算，并不为过。

有人说温州购销员行骗全国。据了解，有一半以上的购销员不同程度地用请客送礼等手段争取客户，请客费用一般要占其营业额的1%至2%。有40%的购销员是守法的，经营作风较正。这些人靠信息灵通，保证质量，按时供货，赢得信誉，保持了一批固定的往来户。搞行贿诈骗违法活动的约占10%，影响很坏，这是需要加以重视并采取措施解决的。

我们认为，温州农村的购销员，实质上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商业，是以中间商的经营方式加入到流通领域中去，与国营商业、供销社并存的个体经济为主体的新流通渠道，是应该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管理和指导。只要引导得法，购销员大军对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起更大的推动作用。

数以万计的家庭工厂如何进行管理

十多万户家庭工厂和十万购销员，都是独立的自负盈亏的个体经济，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又是面向全国各地的，业务往来的数额每户年平均在万元上下，如何加强管理是个问题。工商登记、银行开户、税金计征、合同监督担保，一系列的管理服务工作，只靠市县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温州在实践中摸索出以“挂户经营”为主要形式的一种中间层次的管理方法。所有参加挂户的个体工商户，都统一使用经营挂户的工厂（公司）名称、公章、银行账号和发票；按每户的销售收入或营业额提取一定比例（一般为10％）作为管理费，经营挂户单位从管理费中为各工商户统一交纳税金和乡镇管理费，余下的就是承办挂户企业的收入。承办挂户的企业还负责出面为挂户的个体工商户处理经济纠纷，催还拖欠，提供市场信息等等。如苍南县金乡镇立新五金日用厂原为大队企业，工人离厂办家庭工厂后，留下5名管理人员（厂长、会计、出纳、税务发票管理员和银行财务管理员）承办224户家庭工业的挂户业务。各户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由立新厂实行厂名、公章、账号、发票、管理费五统一。立新厂按挂户的销售收入提取10％管理费，为他们代交产品税（5％）、所得税（2％）、乡镇企业管理费(0.5％)，余下的2.5％即为立新厂承办挂户业务的收入(包括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其它费用和积累）。1985年244户的营业总额为300万元，共提取30万元管理费，除上交和开支，尚有几万元积累。

挂户代理办法，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如金乡镇有200多家挂户承办单位，其中有一部分是县、区党政机关派人办的，实际上是变相的党政机关经商，容易产生弊端。因此，要研究对承办挂户单位的管理监督办法、收费标准和对挂户管理的细则。又如，挂户经营按营业额或销售收入的统一比率（约2％）代征所得税。如上述立新厂的挂户有的年销售收入千元，有的高达10万元，都按2％征收所得税，显然不合理。此外由于允许一个家庭工厂同时在几处挂户，即使实行八级累进税也可以化整为零，使累进额减少，甚至都在起征点之下，也是一个漏洞。据税务局同志反映，温州家庭工商业的税收至少有一半漏掉了。这是急待研究的一个问题。

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有人提出温州试验区成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如何保证国营、集体和个体经济都能得到协调稳定的发展。这几年，农村家庭工业大发展，国营和集体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却面临很大困难。温州市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171家，1985年产值7.75亿元，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8％；经济效益差，百元产值利润5.96元，百元产值实现利税19.8元，大大低于浙江全省的平均水平（11.3元和31.9元），1986年有61家亏损，总额达666万元，约占全省工业亏损总额的三分之一。国营工业企业不少产品无竞争力；职工积极性低落，不少人外出搞第二职业；部分厂长信心不足，有的已离职。二轻集体企业有些趋于“瓦解”状态。

体现在市财政上是“民富市穷”。市财政收入的78%是靠171家预算内企业和422家大集体企业的税收。目前全市每年机动财力仅1000万元，国家拨给的外汇使用额度(1985年1200万美元，1986年906万美元)，都因财力不足使用不了。而家庭工业和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35%，但其工商税只占全市总额的10%左右。所以，从总体上说，必须在支持个体经济发展，加强对个体经济管理的同时，认真研究加快国营企业的改革步伐，真正把企业搞活，使之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使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能够协调地发展，以促进温州市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粮食生产亟须抓紧。温州市有5个县是产粮区，亩产可达双千斤。“文化大革命”前每年调出粮食一、二亿斤，近年来粮食生产连续下降，每年要调进四、五亿斤。1985年粮食总产量比1984年减少了近3亿斤，其中有1.25亿斤是由于单位产量下降造成的。加上毁田建房和调整产业结构每年减少粮田面积约2万亩。如此发展下去，对温州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在温州，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难以靠以工补农的办法，需要摸索一套适合本地区情况的措施。目前有的县、乡开始着手发展家庭农场，让土地适当集中，由一部分种田能手经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也便于在农场范围内调整结构，搞多种经营，以增加务农的收入。如乐清县虹桥区已有种粮大户430个，每户承包种田10亩以上，1986年户均净收入可达3400元，该区连桥村17个大户，户均承包13.5亩，户净收入4000元。苍南县宜山区铁龙乡还试办了一个农民服务社，100多农户自愿参加。服务社为各户的农业生产服务，同时开展多种经营，集资办工业、养殖业、林场，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增加了收入，调动了务农的积极性，已初见成效。

三、个人消费行为的引导问题。一部分农民富裕起来了，有了钱怎样花呢？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在某些方面表现得颇为突出。汽车开进温州地区就看见路旁山坡上排列着大大小小新修的坟墓，据说不少坟是为活人准备的。农村红白喜事讲排场，搞封建迷信活动，也颇为盛行。结婚酒席有多达数百桌，鞭炮灰积在地上厚厚一层。这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研究土地管理、开征个人所得税和引导把个人所得部分用于扩大生产经营的办法。

四、扶助贫困地区的问题。浙江全省有5个贫困县，年人均收入在200元以下，其中3个在温州。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扶助这3个县尽快赶上来，也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此外，城乡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987年4月

·工作研究与建议·

理顺各种关系　搞好租赁经营

——兼谈我是怎样当租赁企业厂长的

喻　志　强

我们武汉金笔厂是一个小型国营企业。去年8月初，在工厂生产上不去，经常发生亏损，职工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实行租赁经营的。当时企业困难重重，问题成堆，如同一团麻，如不理顺，将阻碍租赁改革的进行。为此我着重抓了理顺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工作，才10个月的时间，企业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是生产蒸蒸日上，去年租赁后五个月，完成了全年的总产值。今年1—5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89.3%，提前一个月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二是质量明显改善。去年底在全国自来水笔质量评比中，我厂参加评比的两个品种的九项质量指标全部超过部颁标准，451型普铱笔名列全国第二名，252型高铱笔名列全国第六名，创造历史最好水平。三是效益不断提高。去年8—12月实现利税74.38万元，几乎占全年利税总额的一半。今年1—5月完成利税111.8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4.45%。四是企业后劲增强。去年租赁后仅五个月的时间，便筹措22万元资金用于技术进步，今年又安排了更新改造资金近40万元。五是职工收入增加。租赁前人均月奖是6元，租赁后是30元，职工业余加工收入，人均月收入也有30元。六是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全厂“双增双节”运动广泛开展，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982条，全厂人均增收节支279元。随着企业的迅速变化，工厂的知名度愈来愈高，职工的荣誉感增强，普遍感到厂里有奔头，越干越有劲。

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理顺关系。

一、提高决策能力，理顺经营关系

企业实行租赁经营的目的，就是要增强企业的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其首要任务就是搞好生产经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知名度。针对当前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原材料上涨的情况，我们在销售上一是采取立足本地，扩大外销，提高产品的幅射面；二是恢复名牌，扩大产品的影响，刺激销售；三是继续完善销售承包责任制，巩固全国的销售网点，扩大产品的销路；四是恢复出口任务。现已同外商成交了出口自来水笔24万支和部分散件的任务，还有几笔交易正在商谈之中。

二、实行厂长负责制　理顺党政关系

租赁经营推动了我厂领导体制的改革。过去我们厂是书记说了算，厂长照着办。实行租赁经营后，我想承租人只有充分调动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的积极性，企业才能搞好。因此我的行动准则是：掌权不独揽，用权不武断，决策不单干，监督不反感。从思想到行动上真正做到把党委当靠山，把群众当后盾。对于企业里的一切重大问题，我

积极主动向党委和职代会汇报，征求意见，统一思想。对于一般问题也做到经常通气，力求使自己的决策建立在科学民主和集体智慧的基础上，以减少失误。我这样做，不仅不影响承租人的决策作用，大家心齐，积极性高，反而有利于实行厂长负责制。我厂党委和工会为了保证承租人的政令畅通，不仅在舆论上为承租人鸣锣开道，而且在工作上为承租人排忧解难，真正做到“三分三合”和“四不”，即“职责上分，思想上合；工作上分，目标上合；制度上分，关系上合”。“分工不分家、参与不干预，保证不包办，监督不刁难”。自租赁以来，我厂党政工三者关系理顺了，“三驾马车一个套，同吹一把改革号”。群众普遍反映说：“我厂租赁后的党政关系是建厂三十多年来最好的时期”。现在全厂职工思想安定，热情高涨，经营越来越活。因此多次受到省市领导同志的好评。实践证明，企业实现租赁经营后，党组织和职代会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党工团的工作有了更生动、更具体的内容。如果没有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保证、协调，没有工会和共青团组织的通力合作，租赁企业的厂长负责制是无法得到保障的，更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三、加强宣传教育　理顺干群关系

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后，群众积极支持，同时也有顾虑，担心工厂的性质会发生改变，不把职工当主人，随便解雇。有少数人甚至说：“这样做是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卖命。”为了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搬掉压在群众心中的石头，党委、行政、工会密切配合，先后三次对干部、职工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走访了近百户干部和职工家庭，与200多名干部职工交换意见。先后办了25期黑板报，对租赁经营的具体内容，积极意义等进行系统宣传，并结合厂里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引导工人群众进行思考与讨论，使大家认识到，我们的租赁是社会主义的租赁，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只是经营方式的改变和突破，企业的性质不变，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不变，承租人和职工的关系仍然是同志式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我们还向职工发布了一个“三年早知道”，就是在三年租赁期间，企业完成基数利润后，国家、企业、职工、承租人各得多少，用明细数字标出去，并且讲明这些指标是水涨船高，如果超额完成任务，职工的收入相应增加；如果完不成任务，职工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这样一摆，使群众一目了然，不仅消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密切了职工与承租者的关系，而且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家愿意为实现租赁经营目标共同奋斗。

四、改革干部制度　理顺人事关系

租赁后，我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原来厂级领导、中层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怎么处理。如果采取简单大换班的办法，势必会乱阵脚，影响生产。更重要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租赁原则。我们在理顺人事关系时，注意了这几个方面。一是对原来的厂级领导采取以诚相待的办法，根据他们的专业特长和合理要求进行安排，他们一时想不通，不采取挤逼压的办法，而是耐心等待，允许反复，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二是对竞争对手——参加投标的人，为了打消他们怕给小鞋穿的顾虑，我们与这些同志交谈，肯定他们积极投身改革的精神，讲清投标者的共同目标是改革，今天大家要团结协作，把金笔厂的租赁搞好。对他们中有能力的，一样提拔使用，如三车间金顺康是投标人之一，根据他的

能力，由原来的副主任提为正主任。三是对原来的中层干部，公开宣布决不搞“一朝君子一朝臣”，对他们的工作原则不动，个别调整。这样，大家感到比较满意，安下心来，各就各位，共同搞好租赁工作。

为了提高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保证行政指挥政令畅通，我们充分运用国家给予的人事权力，破除干部终身制，搬掉了论资排辈的铁交椅。根据“任人为贤，选能聘用”的原则，对干部一律实行聘用制，坚持有能力就用，有成绩就奖，有过失就罚。对于一些有开拓精神的能人，那怕是一般工人，也要委以重任。一年来我们先后破格聘用七名工人担任中层以上的领导（包括一名副厂长）。同时我们还注意了优秀青年的培养，一名84届塑料专业的大学生被聘为压塑车间副主任，聘用一名机械专业的中专生为冲制车间副主任。这些同志上任后，都能身先士卒，知难而上，迅速打开了局面，工作很有成效。

对于中层以上干部，我们按照“打不开局面就不算好干部”的要求，先后将六名中层干部调离领导岗位，改做一般工作或当工人。

租赁后我们注意发挥职代会和工会的作用，把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下。每半年由工会和职代会出面对干部进行民主评议，按照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分较好、一般和较差三个台阶，采取面对面背靠背的方法由群众评分。对工作打不开局面，群众普遍不满的干部出示“红牌”，下车间劳动。对群众评议较差的干部，出示“黄牌”，限期改正。我们对干部一直坚持实行聘用和民主评议相结合，这种民主评议干部的做法既体现了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发挥了干部积极向上的紧迫感。同时也密切了干群关系，有利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选优淘劣，唯才是举。

五、打破“大锅饭” 理顺分配关系

租赁经营后，在理顺思想的基础上，我们积极改革分配制度。我们将职工的工资、奖金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一是制订新的劳动定额，对车间工人实行“定额超产计奖法”，完成生产计划保工资，完不成扣工资，超额多奖。对不同的车间则采取不同的计奖方法，不搞一刀切。如压塑车间青年工人较多，高级工较少，唱主角的都是青年工人。我们就采取完成计划拿基本工资，超额部分按高级工工资计奖。这样既调动了青年工人的积极性，又不损害老工人的利益。二是对车间领导干部设立特别责任奖惩制度，车间在质量消耗、品种和安全等指标达到要求后，产量超过2％，开始给车间领导计奖，再超过1％奖伍元，上不封顶。如完不成计划，取消职务津贴、岗位工资，并根据差额部分按一定比例扣工资，以调动生产第一线干部的积极性。三是对机台实行承包，把操作和维修工捆在一起，规定一个维修工包修几台机器，包设备利用率，如果达到了规定的要求，维修工可同生产工人拿到最高奖金；如果机器故障多，达不到工时要求，要扣发奖金或工资。这就解决了过去机台发生故障，操作工不急，维修工不管，经常影响生产的问题。四是变死工资为活工资，鼓励职工都来摘桃子。过去规定工厂每年可以给3％的职工增加工资，它是“一锤定音”，只加不降。我们认为这个规定有副作用，就把它改成了浮动升级，如果第二年他不能保持，那就转给别人浮升。这就可以使每个人都来摘这个“桃子”。五是全厂职工拿一级浮动工资同厂利润目标挂钩，完不成当月利润计划，取消全厂职工浮动工资。由于打破了大锅饭，理顺了厂内的分配关系，全厂职工皆

大欢喜，使生产蒸蒸日上，形势喜人。

总的看来，我厂在短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因为实行租赁经营、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经过法律公证的形式予以分离，厂长的责任加大、权力集中，而且厂长的工作与利益挂钩、责权利趋向统一。这是个大前提，没有这个大前提，厂长再有能耐也不能把企业搞活。所以说搞活企业必须一靠合理运用政策，二靠深化内部配套改革，三靠真心实意依靠群众，四靠党政工团一条心。而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就是租赁经营者要把理顺党、政、工三者关系，调动职工积极性作为自己的基本工作，贯穿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作者系武汉金笔厂厂长）

（上接第13页）

都能立竿见影地给每个人都带来好处。因为改革的效益往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实践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把这些道理向人民讲清楚，对改革的顺利推进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因此，正确认识和宣传价格改革中的“阵痛”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有了“阵痛”的预见，一旦面临改革中出现的“阵痛”呼声，就会主动采取种种必要的措施，使企业尤其是广大消费者因价格改革所感受的“阵痛”减轻到最低程度。并会坚定地把“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方针贯彻到底，夺取改革的完全胜利，而不会惊慌失措，止步不前。

对于财政在改革中受到的“阵痛”，只能通过压缩行政开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举借内外债的方法来承受，并在改革中随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靠增加国民收入来解决。

对一些企业来讲，有了“阵痛”的思想准备，有助于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尽力吸收消化“阵痛”所带来的难题，促进企业改进生产和经营。

对广大消费者来讲，“阵痛”理论一旦武装了他们，将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价格改革中，即使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减痛，但终究难以完全取消“阵痛”，而“阵痛”过后，则是抱娃娃的喜庆，这个道理只要实事求是地向广大消费者讲深讲透，我们相信广大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会用行动来负担价格改革中的“阵痛”，同心同德地争取把关系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搞好。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书评·

华侨、华人、华裔的成就

——读《炎黄子孙在海外》

应 乃 尔

葛仁局同志所著《炎黄子孙在海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内容丰富，读来给人知识，给人启迪，且装帧精美，实为同类书中的佼佼者。

我以为此书的首要意义，在于它起到了给华侨、华人、华裔“正名”的作用。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左”的干扰，“华侨”这个字眼被严重地扭曲了。“海外关系！”于是乎谈“虎”色变，回避为上，“敬”而远之。一边是身处异地的广大爱国华侨、华人、华裔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把自己的祖国视作“生身母亲”，一边是他们及其亲故被一些人无情地打入“另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寒心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出民族的悲剧。葛仁局同志以其深厚的“史识”眼光，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华侨、华人、华裔当中，由于政治上的诸种原因，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但整个儿地说，他们是爱国的，且不乏优秀人物，堪称我们民族的精萃。他们中的大多数，或为战乱，或为饥荒，而离乡别土到海外，都有其悲惨的遭遇。到了陌生的环境，单枪匹马，惨淡经营，又有一个被歧视、被凌辱的身世。凡不为生活所淹没，则在患难中得以定居和发展。还有许多人看到海外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为了治穷致富，而去求知取经，其中一部分留在国外成为华侨或华人，他们中不乏有志有识之士，起到了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作用。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出国，无论后来或富或穷，他们时刻思念祖国，渴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他们既痛恨反动统治者给祖国带来了贫困和屈辱，更盼望祖国的强大和兴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和祖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保持和努力发扬着我们这个五千年的优秀民族文化。《炎黄子孙在海外》集中和详尽地介绍和褒扬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创业事迹，可以说是一个方面的拨乱反正，实在可贵。

二十世纪华侨、华人、华裔在海外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教授、科学家、文学家，还有著名的政治家，越来越吸引人们去研究。中华民族在全世界人口中约占四分之一，远在商周时期就与邻国有所往来，彼此互相侨居。至今，居住在海外的侨民已达三千万人左右，占世界第一位，“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整个的华侨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海外炎黄子孙发扬中华民族刻苦耐劳精神，图生存，求发展，艰苦奋斗的历史。经过多少年的艰苦拚搏，他们的地位和命运才有了明显的变化。许多国家中，华人已成为一支受人重视和注目的力量。例如在美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大约有十二、三万人，其中华人就有三万多人，许多学者如灿烂群星蜚声世界，因此称誉“华人有第一流的头脑”。华侨、华人中有著名的“电脑大王”、“造船大王”、“钢铁巨头”，堪称巨富。他们一变从

·国际问题探讨·

病根不除　改革无望

——简评越南的经济改革与侵柬战争

陈　久　霖

越南自1979年以来，先后多次提出发展经济的改革计划和措施。然而，改革计划实施以来，并没有缓和越南的经济危机。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实现，农业连年减产，工业萧条，能源短缺，物价飞涨。1986年通货膨胀率高达700%以上，预算赤字大约为120亿越盾，国民收入人均不足100美元。对于这场改革受挫的原因，越南当局承认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问题。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这一结论，没有触及到根源所在。

造成越南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日本《每日新闻》1986年12月30日，以《越南“第二代”的责任》为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越南经济重建的最大障碍是柬埔寨问题。”

前“海外孤儿”的面貌，获得了普遍的尊敬。所有这些，足可引以自豪。更值得人们认真思索的是，他们是怎样远在他邦得以立脚安身？他们是怎样保持和发扬着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他们是怎样同当地人民在患难共处中开拓前进？什么是他们的治学经、致富术、成功之道？这些炎黄子孙们特有的素质是什么呢？本书对上述诸问题的回答，不乏有创见的议论，生动的笔触常含丰富的感情。它的可贵之处是，不仅有历史的俯瞰纵观，也有横向的环视博览，可谓“上下几千年，纵横八万里”，同时又有重点地对55位名人更为深入的细描。我很赞成刘耕路同志为本书写的序言中关于华侨特有素质的论述：一是，深深地热爱并长期地保持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二是，热爱伟大的祖国，具有革命精神；三是，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四是，团结互助精神。这些素质，正是中华民族灵魂之所在，使他们通过长期的奋斗走上了成功之路。我以为，华侨、华人、华裔之所以能有所成就，还在于他们处身于完全陌生的异地，既带着本民族的长处，又努力接受新信息，适应新环境。谈到这里，每个人都会想到，华人、华侨、华裔在远离祖国的海外，尚不自卑，终于在自强不息中度过无数艰难，走向了胜利和成功，那么，今天我们的祖国已迈着四化的雄阔步伐，致力于改革、开放、搞活，我们完全应该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定会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炎黄子孙在海外》这本书给我的启迪，也是我乐于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缘由。

（作者单位：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党校）

西德《世界报》1986年12月19日指出：越南“经济崩溃只在很小程度上是由官僚主义、贪污腐化和领导无能造成的。维持越南军队造成的负担要沉重得多。不解决柬埔寨冲突，越南经济的持久恢复就只能是个幻想。”

众所周知，越南是一个只有6000万人口的国家，统一时，满目疮痍。越南当局，本应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然而，越南当局却置人民生死于度外，丧心病狂地发动了侵柬战争。这一战争，不仅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也给它自己的经济增添了十分沉重的包袱。1978年以来，柬埔寨战场，共牵制越军16万多人。由此引起的战场物资供应，伤兵及其家属的扶养，烈士抚恤，退伍战士的安置等开支，十分庞大。为了达到并吞柬埔寨，称霸东南亚的目的，越南还不得不维持着一支120万人的庞大军队，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整个财政收入的50%以上。这在世界上是极为少见的。越南在这场战争中打了9年，已经精疲力竭，它打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越南在这个泥潭中只会越陷越深。当年法、美侵略越南时，他们的经济力量与越南相比要强大得多，都经受不住这种消耗。而今越南如此脆弱的经济，又能支撑得多久呢？越南当局如不早日悬崖勒马，它的经济是难于起步的，所谓的改革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它要求领导精力的高度集中和人民积极性的充分发挥。然而，越南一直陷于侵柬战争的深渊之中，根本无法将领导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连越共“六大”这么一次重要的会议，甚至“都未提出克服紧迫的社会经济困难和满足人民要求的充分有效的办法”（《参考消息》1986.12）。

由于侵柬战争，越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法国《世界报》报道说，“在越南不管什么地方，城市或农村，所见到的人大都骨瘦如柴，面颊凹陷”，“乞讨和露宿街头的现象比比皆是”。法新社1986年1月30日还从河内发出消息说：“外交官和居民们说，越南的经济改革才开始6个月，但其经济仍然急剧衰退，当地人民怨声载道，领导集团中关系紧张”，“现在咖啡馆里，大街和餐桌旁，人们谈论的全是有关当前经济上令人头痛的事”，“一些大城市里开始出现社会骚乱”。

改革需要宽松的国际环境。可是，越南侵柬反华，众叛亲离，国际地位日益下降。自1979年以来，每届联大都要讨论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问题，并通过谴责越南的侵略，要求它从柬埔寨撤军的决议。我国和东盟以及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还通过停止、削减援助，断绝贸易往来等方式，对越南侵柬给以经济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从1983年起停止向越南提供援助。奥地利《新闻报》1986年12月13日评论说：“由于袭击柬埔寨，越南陷入了几乎是完全的孤立”。法新社1987年1月1日也撰文说：“分析家们说，越南领导人曾说，他们希望吸引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但是，只要它的军队继续留在柬埔寨，河内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目前，只有苏联每年给越南20亿美元的援助。可是近年来，苏联逐渐对援助越南产生疑虑，担心它是个无底洞，苏越关系不断出现磨擦。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侵柬战争是越南改革受挫的主要根源，只要它不割掉这个肿瘤，其改革就没有希望。

（作者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八七届毕业生）